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Translation in Asia: Past and Present

亚洲翻译传统 与现代动向

孔慧怡 杨承淑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研究论丛(3)

Translation in Asia: Past and Present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

孔慧怡 杨承淑 编

Edited by Eva Hung and Yang Cheng-shu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孔慧怡 杨承淑 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

(翻译研究论丛;3/孔慧怡主编)

ISBN 7-301-3925-5

I. 亚… II. ①孔… ②杨…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87 号

书 名: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

责 任 者:孔慧怡 杨承淑 编

责 任 编 辑:张文定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3925-5/H·0428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6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一版 200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孔慧怡 (5)

第一部分:传统

中国翻译传统的几个特征	孔慧怡 (15)
朝鲜时代的汉语译官	杨秀芝 (38)
近代日本两种对立的翻译规划	若林·朱迪 (54)
从莎译看日本明治时代翻译文学	王克非 (72)
泰国的翻译传统	奥查罗恩 (82)
马来西亚翻译史述	黄福群 (95)
翻译活动在香港教育及社会演变中的角色 ...	张佩瑶 (116)

第二部分:现代

当代中国的翻译	臧仲伦 (143)
现代韩国译界动向	孙志凤 (159)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专业翻译的发展	柏坦玛桑 (178)
浅谈台湾文学的英译	彭镜禧 (182)
台湾口译发展的趋向与特征	杨承淑 (190)
作者简介	(205)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为工具,外来的知识明显地牵涉到外语,所以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和翻译活动脱离不开。

公元8世纪,回教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献,同时也引进源于印度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拉伯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8世纪到13世纪这几百年里,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执全球科学文明的牛耳;同时,回教在教义和理论方面,也因为受到古希腊学术的冲击,而建立起更完备的体系和规则。

公元12世纪,欧洲以西班牙、北意大利等地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并且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重新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些在欧洲早已成为绝学的文献,从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直接带动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大革新。假如我们说,西方现代文明的缘起,就在于这一次建基于翻译和重译的文化承传,也决不是夸大之言。

以上两个例子,正好说明翻译活动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促进文化发展的力量。但是假如我们再思考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在这段时间之后的发展路向,我们会发现它们虽然都以古希腊学术成果为基础,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同样的文献以翻译的方式介绍到两个地区,到最后会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后果呢?既然外来知识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最终的分别肯定是在于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环境的差异了。因此,这两个例子也告诉我们: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和上述阿拉伯和欧洲类似的经验,通过翻译引进外来知识,达到文化上的飞跃发展和重大革新,其中最触目的例子,莫过于历时超过10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始于公元1世纪末而大盛于公元4至8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语言、文学、民间艺术、本土信仰、宗教组织、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因为佛学通过翻译在中国传播而有了新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源于本土的哲学思想在佛经翻译的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因为得到佛学思想的启示,完成了极富历史意义的自我更新——宋明理学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同样,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通过翻译引进中国的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不但在当时的先进士大夫群中造成影响,也间接对清末力求国家自强革新的知识分子起了启发作用——通过翻译而得以传播的外来知识,在朝廷禁教之后,并没有完全烟消云散。从历史和文化意义来看,清末改革派希望从“西学”入手,达到富国强兵

的目标,可以说与明末士大夫对“西学”或“天学”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翻译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证明翻译活动引起的主体文化(host culture)反响是深远而又持久的;但中国本土文化所提供的环境,在上述不同的翻译活跃期,到底如何有选择性地使外来知识引上某些轨道,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样的研究才会充分显示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枢纽,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在于什么地方。综合上面所列举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要从事深入的翻译研究,应该考虑两大范畴:第一是主体文化的规范和环境,第二是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在一段长时间里产生的相互影响。

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范畴之内,从事研究的人很难脱离“原文”观念的限制,也因此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但正如上文提到,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乎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文本或翻译机制,而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面对中国翻译传统如此丰富的材料,实在让人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慨叹。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翻译研究论丛》这套书的着眼

点,正是从主体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希望通过分析前人的经验,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达到更深入的了解。

孔慧怡

1998年2月于香港

前 言

孔慧怡

翻译研究在亚洲

当代翻译学的发展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学科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增强,一是广义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上述两点可以说是国际性的现象。翻译学科在亚洲各国发展的速度虽然不一样,但上述两种趋势是各国明显的共同点。

另一个共同点是直到目前为止,在本土研究方面仍然缺乏稳固的根基。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学科,在 20 世纪后半期才发展起来,因此不免受到这个时代的特点影响:第一,是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强势形成了一股以西方语言、文化规范为主导的力量;第二,是亚洲各国的学校系统与学术架构的发展,也以西方模式为参照,因此无论是基本运作或是上层建筑,都难免以西方路向为主导。翻译学在亚洲的发展一直受西方规范牵引,这正是主因。这样的客观环境,对本土研究自然缺乏鼓励作用。

但缺乏本土研究的支持,却也正是翻译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主要原因:从本土文化的主流发展来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翻译活动只是一种对外沟通的工具,在本土文化舞台

上只扮演辅助角色,只有在文化自信心处于低潮的时候,才会大肆标榜这种工具的价值,把它拉到舞台中心;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文化主流最终的愿望仍然是看到翻译活动的关键地位慢慢消失,因为那正代表本土文化势力稳步上升。

即使我们撇开西方强势文化对亚洲翻译研究造成的特殊引力,从本土文化的主流角度看翻译学,学科的本质就已经带着难以摆脱的边缘性。翻译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进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任何文化引进外来知识和观念的最直接途径。但正因为翻译推动的是一个从外而内、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所以从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永远是边缘性的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因为当外来的知识一旦被本土接受,成为本土规范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这些知识和观念就与翻译再没有关系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本土文化大多数人接触已经顺利进入本土的新事物和新知识时,都不会特别注意其外来性。这个现象在所谓强势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强势文化虽然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知识,但却同时会为自己营造做出不假外求的形象,因此对翻译活动的功能和地位就愈见低贬了。(从历史角度而言,中国正是强势文化如何看待翻译活动的一个好例子。)

多元文化潮流带来的转变

近年多元文化这个观念的兴起,对翻译研究可以说是一支强心针,因为它带动了一般人对非本土和非主流事物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化中心垄断一切的局面,让边缘和非主流得到比较多的关注和活动空间,而这正好就是翻译

所立足的范围。同时,多元文化观念也带来了一股“寻根”的动力,让大家注意到强势文化以外的各种规范。不过,在不同文化里,扎根本土的翻译研究到底是否可以为大家揭开翻译活动各种层面的面目,抑或只是围绕意识形态打圈子,就只能看研究者是否能够抛开种种桎梏,从可靠的资料中寻找真相了。过往也曾有打出本土名号,而依然引用特定意识形态和西方传统框架的例子,可见要摆脱固有的桎梏,的确是知易而行难。

翻译活动的本质既然必定与外来知识和文化有关,因此即使是扎根本土的研究,也有很强的外来成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各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由于地理和文化两方面的因素,亚洲各国在翻译活动上不但都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整个亚洲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可以见于各国的历史记载,而事实上这些活动远比笔录的史传悠久。不过,直到近年为止,翻译史仍然是一个冷门的项目。这与上文提到翻译学在亚洲发展的偏向,以及翻译活动本质上所带有的边缘性,都有明显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方面的研究严重缺乏,已经显示出文化氛围的改变。

近年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学术研究愈做愈狭窄所带来的弊病,翻译活动既然有先天的跨文化本质,因此很适宜用以带动比较整体和全面性的研究;而其中翻译史的跨国、跨学科可能性是极大的。本书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历史翻译活动,我们不但可以在这些论述中看到各国、各地的语言、社会及政治状况,亦可以追寻国与国之间各种文化渊源。这正是我们构思这本论文集

时其中一个主要目标，也是过去极少有人触及的范围。

亚洲两种文化传统带来的难题

本书第一部分的论文也展示了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现象：今日的亚洲各国原来属于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类型，一是笔录传统，一是口述传统。前者的明显例子是中国、韩国、日本等从早期便注重文字记载的国家，后者最显著的例子应该是印度（可惜我们这次并未能收入讨论印度翻译史的论文），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其实也在口述传统之内。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传统给我们带来性质很不一样的难题。

笔录传统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历史文献，但因为任何记载都反映记录者和他的年代的特定看法和价值观，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分析记载中的主观和客观成分，从而对事情得到比较真确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历史材料有很大的偏向和局限，因此即使在笔录传统，也有某些关于翻译的层面是缺乏记载的。此外，因为翻译活动一般都不是史料的重要主题，因此我们要得到有关材料，就要涉猎种类和数量极庞大的古籍，从不同的记载中寻找相关的一鳞半爪，希望可以由此拼凑出一幅比较完整的画面来，这可以说是渔翁撒网的做法。要处理数量庞大的传统资料，是一项极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中国很多学人呼吁大家在翻译学方面应该走什么路，应该做什么研究，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

罕见,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没有多少人肯立下“白首穷经”的决心。

但总的来说,口述传统对研究者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可以用作研究基础的材料实在缺乏。打一个比方,如果要拼凑出一国的翻译传统是一种拼图游戏,那么以笔录传统而言,图画的很多碎片散布在各式各样的文字记载之中,而在口述传统,图画的大多数碎片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研究,有相当程度依赖考古的发现,从出土文物推断本国在不同年代与外国交流的情况;也要依赖别国的文字记载,由此得出一些本国口述传统没有留存下来的资料。以东南亚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史料和西方的记载都是他们寻求本身传统时可以运用的工具,其中又以中国的记载历史最悠久。这个情况正好说明,要研究翻译传统,必须采取跨学科、跨国度的办法。

我们看本书讨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翻译传统的论文,就会发现二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东亚国家的论者以史料为起步点,可以引用的材料非常多,而讨论也可以举出相当多实例;东南亚国家的论者以描写本国的民族和语言特色为起点,而他们列举的翻译实例,相对来说是很近期的。这是笔录传统和口述传统造成的一种基本分歧。我们应该强调一点,就是这种分歧并不代表笔录传统的国家在翻译和传译活动方面比口述传统的国家有更悠久的历史,只不过是他们有更悠久的文字记载,因而在我们这种崇尚文字的文化之中,在研究时占了一定程度的便宜。

即使同样是属于笔录传统,也不代表国与国之间的翻译方式和规范就会因此而有相似之处,这还得看每一个国家的

文化经历。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与日本同属笔录传统的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且在翻译活动方面更有长期而紧密的关系，但两国的翻译规范却有明显的基础性分别。这固然说明了本土文化在厘定规范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带出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亚洲各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也有其显著的独特之处，绝非用几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概括的。

口译的蓬勃发展

假如说亚洲各国的文化、社会架构和历史经验是造成各国翻译传统异同的基本元素，那么近年各国体会到传译活动的迫切需求，正好说明在过去数十年，通信、科技、商贸活动的扩展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更大的共同性。传译行业可以说是和人类的文化、商业活动同时诞生的，但其运作系统化、专业化，却只是 20 世纪后半的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传译在二次大战后世界触目的纽伦堡战犯审判过程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个别国家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里程碑，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南非：南非的新宪法把法定语言从 2 种增加到 11 种，把全国对翻译和传译的实际需求从隐性变为显性，也因此而带动对质量要求的提升，其中口译活动扮演的触目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南非近年的经验正好说明国家的语言、文化政策对翻译活动的质和量都有很大影响，而南非绝不是特殊的例子。香港在 70 年代初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而引起笔译需求大增，更直接带动同步传译在香港的发展。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对翻译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并不只是国家政策,商贸和交通的发展也是两股庞大的推动力。与上一辈的人比较,今日亚洲各国的国民与邻邦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接触量可说是惊人的。跨国商品流通固然制造极多对笔译的需要,而人口迁移、旅游、商业洽谈、国际会议等的频次不断增加,新媒体的出现等等,不但令口译活动量激增,同时亦带来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口译需要。对口译发展的探讨在本书第二部分占了重要的篇幅,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种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趋势。

翻译学科的实用性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传统的文、史、哲研究相比,有更强的技术性和实用的一面,本书有关现代的部分对此也有充分的报道。今日高等教育面临各种转变和挑战,很大程度来自所谓市场机制。翻译学的实用性对学科的长远发展到底是利是弊,虽然言之尚早,但它肯定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则似乎不成疑问了。这种实用特质除了已经显示于课程设计之外,也同时体现于老师和学科在大学系统里的定位:大学成立翻译中心,安排教师从事商业性的实务工作,可能还不算普遍,但本书报道的泰国例子,却绝非仅有的一个,分别可能只在于规模大小,以及同类的安排在不同的学府以什么机制运作而已。本书举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翻译中心为例,主要原因是它在“面向市场”方面,在学界可以说走在前头。不过进一步说,翻译科的师生尽管以个人身分从事有报酬的业务工作(这当然是很普遍的

情况),也始终和他们作为大学的一员不能完全脱离关系,因为他们在学界的地位的确可以为他们带来私人业务。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系统仍然是整个机制的一部分,与本书举出的泰国案例,也许区别只在于主动程度的大小。

上文说到,当代翻译学在实践方面愈趋专业,在理论方面从窄到广,其实二者都是受到文化氛围和社会动向的影响。目前翻译学研究方向的分化与分歧,也许除了显示学科本身的多元性质以外,更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质;观察学科在亚洲不同国家的发展,应该有助于我们对此达到更全面的了解。

关于《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国际研讨会》

这本论文集源于1998年4月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台湾辅仁大学翻译与传译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联合筹办。

早在1995年,我已有意推动亚洲各国在翻译研究方面的联系,但苦于多半时间和精力都已投入几项大型研究计划,在定期联系亚洲同行方面,不免力不从心。1996-1997年间,台湾辅仁大学翻译与传译研究所所长杨承淑教授因主持电视传译的管理工作,来往于港台之间,次数非常频密,我们也因此多了见面的机会。一次闲谈中,我提到有关探讨亚洲各国翻译史和当前发展的可能性,杨教授得知我的主要顾虑是筹备工作需时,怕个人难以独力承担,马上表示愿意合作,以便促成此事。最难得的是,杨教授更提出有关会议的

直接经费,可以全数由辅仁译研所负责筹募。

经费和人选是组织研讨会最关键的问题。前者因杨教授大半年的努力得以解决;后者除了我们二人在亚洲几个国家原有的联系外,也得到当时辅仁大学文学院的欧阳玮神父(Father Vargo)推荐了几位学者,因此会议筹备工作不到一年就顺利完成了。在此期间,辅仁译研所的杨文姬女士承担了很繁重的联系和文书工作,是会议的幕后大功臣。

这次来自亚洲各国的与会者熟习的语种各有不同,会议以中、英文为工作语言,而很多参加者只是熟悉其中一种语文,因此同步传译就成了必要的沟通渠道。尤幸辅仁大学是一所能提供专业会议传译研究生课程的学府,译研所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各届毕业生义务回母校“出口相助”,为整个会议提供专业水平的同步传译。在我的经验中,这在华人社会举办的翻译学研讨会来说,是非常罕有的,值得在这里留下一个记录。

1998年11月26日